

俄国斯托雷平改革思想评析^{*}

解国良

【内容提要】 对斯托雷平改革的研究经历了阶级视角、还原真相和思想视角三个阶段，学者们终于认识到思想对行为的支配作用。斯托雷平改革是在思想泛滥的社会条件下展开的，他一方面通过民族法制国家的建立对恣意妄为的社会进行规范，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土地改革建立公民法律意识。斯托雷平把俄国专制制度和东正教意识当作俄国的宝贵财富，并试图通过宗教改革点燃俄罗斯人民的信仰火炬，把俄国引上理性和真理的道路，其行为具有保守主义思想性质。然而，俄国东正教会的“凯撒化”让人们丧失了独立判断的能力，依托沙皇尼古拉二世支持的改革因尼古拉二世的利益纠葛而夭折，俄国重现冲天革命。直到普京执政提出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斯托雷平改革思想才重放异彩。

【关键词】 俄罗斯思想 民族国家思想 公民社会思想 保守主义思想

【作者简介】 解国良，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亚太国家现代化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

斯托雷平改革（1906～1911）距今已经100多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学者的研究视角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时期，学者多以阶级视角研究改革，代表人物是C. M. 杜勃罗夫斯基。他说：“所谓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是政府采取的基本措施。斯托雷平改革具有阶级性质。它的实施是为了满足地主、资本家和农村富农的利益。这是不多的少数人为了保存半农奴制土地所有制作为地主国家的基础、保存君主制政权以及地主农奴主一整套专政制度而对基本农民群众实行的强制。”^①阶级视角的最大问题在于把地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不同性质混为一谈，忽视了斯

^{*} 本课题为国家留学基金委和亚太国家现代化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助课题。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疏漏之处由笔者承担。

^① Дубровский С. М.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земельная реформа, М.: Изд.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63, С. 11.

托雷平为建设现代俄国所作的贡献。苏联解体之后，学者们逐渐转向历史真相的研究，代表人物是 Б. Г. 费多罗夫、Г. 西多罗夫宁。费多罗夫说：“许多人提起了任何人都不知其本质的土地改革……剩下的只是来自苏联教科书中的模糊记忆与神化。我们就这样被长期欺骗着，我们事实上不知道历史本身。”^① 于是，俄罗斯学者编辑了大量档案材料，出版了大批全面介绍斯托雷平的生平传记^②。然而，细读这些作品，除了为斯托雷平改革增加一些慨叹之外，对未来社会生活带来任何改变。于是，学者们转向了斯托雷平改革思想的研究，代表人物为斯托雷平遗产基金会主席 П. А. 博日盖洛。他说：“作为现实的有思想的政治家，斯托雷平考虑了早期西欧革命的经验，理解国家在系统危机条件下的复杂性和二重性，所以，在过渡时期他建议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个是想办法停止革命并使国家摆脱危机，实现社会的政治稳定。另一个是进行系统的改革，最终让俄国成为动态的伟大的俄罗斯。”^③ 博日盖洛的研究让人意识到，俄国的危机不再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不协调，而是思想停滞的危机。

斯托雷平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他解决的办法不是简单地分地和投资，而是激发个性活力，用思想指导行为，合理组织社会生活。斯托雷平把自己的改革定性为建设伟大的法制国家。他尊重俄国东正教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同时接受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被俄国思想家 П. Б. 司徒卢威称为保守的自由主义。受人脑自动反映物质观念的影响，司徒卢威把经济上的土地私有化改革称为自由主义，而把上层建筑的外在装饰称为保守主义^④。俄国宗教哲学家 Н. 别尔嘉耶夫则把这种现象直接定性为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过去的回忆、祖先陵墓的尊重，另一方面表现为历史中的创造性活动^⑤。这样，别尔嘉耶夫就指出了价值对行为的重要意义，把虚无主义直接归结为保守主义的缺乏。别尔嘉耶夫说：“当保守主义阻碍创造性激情和运动时，当保守主义停止揭示和创造新价值的脚步时，保守主义的原则就变成了谎言。”^⑥ 俄国革命是价值虚无主

① Фёдоров Б. Г.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П. А. Столыпина, М.: Горева, 2003, с. 7.

② Геннадий Сидоровни, П. А. Столыпин 1862 – 1911 Жизнь за отечество, М.: О – во созрания лит. Наследия, 2014.

③ Пожигайло П. А. Шелохаев В. В.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Интеллект и воля, М.: РОССПЭН, С. 15 – 16.

④ Струве П. Б. Patriotica: Россия. Родина. Чужбина, СПб.: РХГИ, 2000, С. 171.

⑤ Бердяев Н. Духовные основы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пыты 1917 – 1918 гг. Изд. РХГИ, 1999, С. 320 – 321.

⑥ Там же, С. 323.

义的结果，是本能的释放，因而不具备任何创造性。美国学者理查德·派普斯直接强调“思想的独立意义”，即俄国的危机在于人们失去了对生活的价值认识，成为物的奴隶。当生活压力达到极限的时候，引发的便是对生活的毁灭。所以，派普斯说：“思想总是反映利益的观念之所以站不住脚，只是因为‘利益’是价值观即思想决定的流动的概念。”^①

斯托雷平是在恣肆泛滥的情况下担任总理大臣的，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建立起对祖国的价值认同，以此重建俄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形成民族国家思想、公民社会思想和保守主义思想。

一 民族国家思想

斯托雷平在担任总理大臣之后的第一次杜马发言中指出：“现在内阁提交给杜马的政府法律草案贯穿一个总的指导思想，也是政府在未来一系列活动中遵循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便是建立贯穿于以后所有改革、体现新型法律关系的物质规则。根据君主意志改革的我们的祖国应该变成法制国家，因为当成文法不能决定义务，没有保护俄国臣民的个人权利时，这些权利和义务就将取决于个人的解释和意志，也就是说它们将不能得到牢固的确立。”^② 斯托雷平的这一宣告标志着斯托雷平民族国家思想的诞生。

民族国家涉及民族主义思想。俄国民族主义思想的诞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这一个时期民族主义思想似乎还处在酝酿之中，不具备思想轮廓。第二个阶段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 1863 年波兰二次起义之后，这一个时期称为“自为的民族主义”阶段^③。俄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俄国的专制主义是有机的民族需求，没有这个需求，俄国就不能存在。第二，俄国的民族主义建立在完整、巩固、力量和伟大的基础上，帝国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第三，大俄罗斯民族占据统治地位。第四，确定和巩固以上特征的东正教是俄国民族的固有特征^④。

① Пайпс Р.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Нов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2008, С. 14.

②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М.: Мол. Гвардия, 1991, С. 51.

③ Дробкина Е. 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 колони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М.: ЛЕНАНД, 2015, С. 33 – 34.

④ Там же, С. 32 – 33.

苏联学者 А. Я. 阿夫列赫根据以上特点把斯托雷平称之为俄国沙文主义。他说：“斯托雷平是有信仰的和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伟大的俄罗斯’这句话不只是漂亮的言辞，还是像农业方针一样具有重要意义的纲领性口号。他也正是依靠这两大支柱建设‘新俄罗斯’、‘俄国人的俄罗斯’，这是从极右派到十月党人在内的俄国沙文主义者的战斗口号。”^① 沙文主义与民族解放相对立，因而有了“沙皇俄国各民族监狱”的论述。俄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也有了从俄国独立乃至分离出去的理由，成了俄国分崩离析的理论前提。

1881 年亚历山大三世执政之后，俄国的确出现了限制少数民族权利的法规，也出现俄国人欺辱少数西部发达民族如波兰人、芬兰人、犹太人、波罗的海人的现象，从而引发了他们的革命化浪潮^②。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俄国提出通过三权分立的共和主义主张解决此问题，引发了俄国内部建立什么性质国家的争论。斯托雷平把建设三权分立的自由宪政的共和国称之为幼稚的主张。他说：“追求全面了解世界历史并准备担任部长职务的人，全面陷入麻醉状态。他们幼稚地认为，刚刚用武力强制召开的年轻的国家杜马，通过在杜马发表讲话改变生活轨迹，并使改革前的俄国变成实现绝对政治自由、无条件的社会平等的乌托邦国家。”^③ 斯托雷平在谈论俄国与波兰国家不同特点时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理由。他说：“可以把国家理解为由一个共同的法律、共同的行政连接的、由一个个人、一个个种族、一个个民族组成的联合体。这样的国家像一个混合物，维护和保存的是现有的力量对比。但是，也可以把国家理解为另一种样子，可以理解为体现人民历史原则的力量和联盟。这样的国家在实现了人民夙愿之后，就产生了意志，具有强制的力量和权力，这样的国家让一个个人和一个组织的权利服从整体的权利。我认为俄国就是这样一个整体。我认为，俄国的立法者就是这种国家性世代相传的体现者。”^④

斯托雷平关于国家的论述只是说明了俄国的法律因不具有宗教信仰基础而显得缺乏力量，绝不意味着他把国家划分为两种类型^⑤，也没有把俄国与西方两种文化对立起来的意思。否则，就不能理解斯托雷平如何在东正教的基础上创建法

① Аврех А. Я. П. А. Столыпин и судьбы реформы в России. М.: Изд.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1, С. 130.

② [美] 沃尔特·Г. 莫斯：《俄国史（1855～1996）》，张冰译，海南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5 页。

③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28

④ Там же, С. 340.

⑤ Пожигайло П. А. Шелохаев В. В.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Интеллект и воля. С. 20.

制国家。他说：“先生们，人民不明白法律，不明白类似宣称东正教、基督教和异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平等的高高在上的法律。先生们，我们的任务不在于让东正教适应良心自由的抽象的理论，而在于点燃我们俄国东正教国家信仰自由的火炬。先生们，不要让我们的法律草案因让人民产生歧义和不理解而成为累赘。要记住，信仰的法律将在俄国发挥作用并将得到俄国沙皇，即过去现在将来一亿多人的东正教沙皇的批准。”^① “而国家也在新的法律范围内不能脱离历史的遗训，它提醒我们，俄国人民在所有时期、所有事情上体现的是东正教名义的精神，祖国的荣誉与强大无不与之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与此同时，东正教教会的权利和优势不能也不应该破坏其他学说和信仰的权利。”^② 这样，斯托雷平通过把法律与东正教信仰联系在一起，找到了俄罗斯立法的思想基础。

就君主对法律的作用而言，斯托雷平说：“在这方面，君主的意志不止一次地证明，最高政权虽然碰到非常大的困难，但是非常珍惜立法秩序和国内重新确立的、君主从上面赐予的代表制度清晰界限的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上的专制政权、历史上的君主权力和君主的自由意志就是俄国国家性的宝贵财富。”^③ 就下层而言，“当农民还很贫穷、当他还没有个人土地所有权、当他还处在村社的钳制之下，当他仍然是奴隶的时候，任何成文法律都不能给他带来公民自由的福利。”^④ 当波兰代表谈到为了代表制必须吸收地方力量参与地方自治的时候，斯托雷平谈到了“多余的力量”。显然，俄国不具备这样“多余的力量”，因为他知道，“俄国无论是在彼得前还是在彼得后，地方力量总是承担服务于国家的义务。要知道，各个等级从来不以西方为楷模，不与中央政权作斗争，而是总是服务于他的目的。所以，我们的改革要想有生命力，就应该从这些民族原则中汲取力量，就是发展普通百姓，发展自治，把部分国家的义务、国家的重担分给他们，并在下层培养与国家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牢固的大地人民。”^⑤

斯托雷平知道，建设以俄罗斯人为中心的民族国家，势必遭遇像波兰、芬兰以及犹太民族的反抗，但是，他没有从民族的角度制造这样的障碍，而是从一个

①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219.

② Там же, С. 53.

③ Там же, С. 102.

④ Там же, С. 105.

⑤ Там же, С. 106.

完整的国家角度看待彼此的联系。他在谈论芬兰问题时说：“先生们，各个民族有时会忘记自己的民族任务；但是这样的民族将要灭亡，将要成为其他更强大民族发展和巩固的粪肥。我们要求你们的不是牺牲，我们也不要求你们剥削其他弱等民族——没有，先生们。政府要求你们只是从道义上支持他认为是正义的事业。”^①因而，就发展西部地方自治中强大的波兰与弱小的俄罗斯人来说，他既照顾到了西部个人力量发达的波兰人，也照顾到了弱小的俄罗斯人。他通过在西部地区实行地方自治，进一步让强大的波兰人、犹太人和波罗的海人融入俄国，同时也通过设立民族选区——俄罗斯选区，通过降低选举人的财政门槛把中小俄罗斯人吸收到地方自治局中，通过权力加强与波兰的竞争力。斯托雷平说：“政府法律草案的目的不是剥削西部边陲波兰本地人，而是保护俄国本地人。”^②

斯托雷平的做法是真诚的，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化解俄国强弱矛盾的目的。他说：“我不愿相信，俄罗斯和波兰选民可以卷入完全不需要的和毫无结果的政治斗争。但是，先生们，除了这样做，不再有别的出路；除了这样做，因害怕走俄国僵化道路而无法阻止又好又富的边陲发展；除了这样做，不能再推迟进而长期遗忘在边陲实行地方自治。因为不这样做很容易，一旦这样做了，那么在俄国西部多难的历史中将再填上一页——俄罗斯失败的一页。被压制和被战胜的将是复兴的俄罗斯自我意识——而且不是倒在厮杀的战场，不是败在刀剑的力量之下，而是倒在了思想的竞技场，死在理论的催眠和漂亮言辞的力量之下。”^③最后，斯托雷平告诫反对派说：“我知道，你们在这个问题上占优势的思想和政府的思想是两个世界，是对国家和国家性的两种不同的理解。对于广阔的边陲来说，这可能是他历史命运的转折点，对于俄罗斯，这可能是民族未来的预定。”^④

二 公民社会思想

斯托雷平在提出民族国家思想之后继续说：“在没有研究趋向不同阶层平等和信仰自由的法律之前，我认为必须研究以非常形式通过的构建农民日常生活的法律，而实施它的紧迫程度是无须解释的。……不能拖延履行沙皇不止一次表达

①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149.

② Там же, С. 285.

③ Там же, С. 338.

④ Там же, С. 352.

的意志和因土地无序而精疲力竭的农民不厌其烦重复的请求，这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义务，是刻不容缓采取措施阻止已经出现的俄国人数最多部分瘫痪的义务。”^①

1905 年 10 月 17 日宣言和 1906 年国家根本法规定：皇帝陛下与国务会议和国家杜马共同实现立法权，任何法律没有获得国务会议和国家杜马的赞同都不能成立，不经皇帝陛下的批准不能生效^②。虽然宪法规定，在国家杜马休会期间，如果特殊的形势要求必须采取按立法程序进行讨论的措施时，大臣会议可以直接将其提交皇帝陛下；但是，涉及农民土地问题的立法采取这种办法，恐怕就不是紧急情况可以说明的。这也成为政府与杜马冲突的一个理由。立宪民主党领袖 П. Н. 米留科夫就此问题在 1907 年 3 月 8（21）日《言论报》上写道：“政府给杜马报告的共同计划的基本思想与‘关于让农民最终摆脱孤立地位’的思想是完全一样的，对采取这个措施有兴趣的是贵族联合会，现在采取紧急措施就是保证杜马立法方针运行在贵族利益的航道上。”^③

斯托雷平将左派激进政党以及自由派政党的土地纲领归结为党派利益的需要。例如，他在分析左派人士卡拉瓦耶夫（Караваев）、策里铁里（Церетели）、沃尔克-卡拉切夫斯基（Волк-Карачевский）的建议时说：“承认土地国有化，在实行土地国有化时赔偿没收的土地或者不做赔偿，都将导致历史上见所未见的类似转移所有价值、改变所有社会、法律和公民关系的社会变革。……如果国家承认这是福利，那么不用说它将无视无数受教育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的破产，还要无视整体的破产，容忍稀缺的地方文化源泉的毁灭，——这将导致什么结果？允许采取这样极端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即便从物质方面考虑会带来什么后果？大概它的发布或者没有可能让各地的农民心安理得吧？”^④对于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他同样这样认为：“这个党的报告人在自己的讲话中对土地国有化原则持批评态度……但是，既然承认没收的原则，那么谁会相信如果需要没收农民土地，他们不没收土地，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左派政党的方案来得更加真诚、正确，承认重新审查劳动定额，剥夺家长多余的土地。”^⑤

在斯托雷平看来，土地国有化来源于俄国人的平均主义的价值理念，而这一

①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51.

② 刘显忠：《近代俄国国家杜马：设立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1 页。

③ Богодин А. П. Столыпин реформы во имя России, М.: Вече, 2004, С. 144.

④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87 – 88.

⑤ Там же, С. 90 – 91.

点成为阻碍俄国农民进步的障碍。首先，他从平分土地的效果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说：“先生们，即便现在不只把私有土地，还要毫无遗漏地把城市土地分给现在已经拥有份地的农民支配，加上现有的土地，像沃洛格达省也不过每户 147 俄亩，奥伦涅茨省每户 185 俄亩，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每户 1 309 俄亩，在 14 个省每户不足 15 俄亩，而在波尔塔瓦省每户只有 9 俄亩，在波多尔斯克省每户只有 8 俄亩。……由此可见，即便按人头分配所有土地，也未必能够满足各地的土地需求；为此还必须诉诸政府正在实施的移民手段，以及必须让所有劳动人民放弃分配土地和不把一部分人口转入其他劳动领域的想法。”^① 其次，他又从道德角度研究了这一问题。他说：“每一个公民都会知道，他有权声明获得土地以便耕种，接下来，当他厌倦了，就会抛弃土地并再次满世界闲逛。于是，一切就有了对比，然而，懒汉不等于劳动能手，智力愚钝的人也不等于劳动能手。这样，国家的文化水平下降了。好人、有办法的人因这样的情形失去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土地的机会。”^②

平均主义的观念不仅是俄国经济落后的渊藪，更是社会逐渐衰败、萎缩的原因。斯托雷平从人性的角度认识到了这是一种病态。他说：“现在，国家正在患病。患病最重、最孱弱，也是最萎靡的部分就是农民。应该帮助他。有人提出了一个简单、自动和机械的办法：就是把现有的 130 000 个庄园夺过来平分。这还是国家吗？这让我想起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故事，这不是缝了袖子剪了前襟吗？先生们，不能强化病体，这是割自己的肉养自己的身体；应该给有机体注入活力，为病体注入营养汁，那时，有机体才会战胜疾病；无疑，这件事全国都应该参与，国家的各个部分都应该帮助现在最弱的这个部分。”^③ 然而遗憾的是，患病的是全国的大多数人，而不患病的只是少数。如果此时根据托尔斯泰给斯托雷平提出的建议，即“为了安抚人民，现在需要的不是扩大各式各样自称农民（通常都这样看）的俄国人的土地数量，而是消灭世代流传的古老的不公正……不公正在于，既不能存在一个人控制另一个人的权利（奴隶制），也不能存在一个人占有土地，即所有权的情况，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沙皇还是农民，”^④

①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88.

② Там же, С. 89.

③ Там же, С. 94.

④ Сидоровнин Г. П. П. А. Столыпин. Жизнь за Отечество.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1862 – 1911) . С. 292 – 293.

那么，通过杜马立法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俄国就会陷入平均主义小农的汪洋大海，俄国的农民不仅不能得救，而且刚刚培养的一点公民意识也会消失。

所以，斯托雷平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法具有培养公民意识的作用，不是简单地解决土地问题。第一，解散村社，建立土地私有制；第二，通过国家购买提供出售的私有土地、皇室与国家土地，建立土地储备；第三，通过出售的办法以优惠的条件卖给缺少土地和实际耕种土地的人，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第四，改善土地的使用形式^①。这样，“整个国家、所有的阶级都帮助农民获得他们需要的土地。参与这件工作的不仅有国家赋税的支付者，还有官员、商人、自由职业者、农民和地主。重担又不会平均落到人数不多的 130 000 个人身上，也不会随着这些人的消失而消灭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的源泉。”^②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调整，农民为了改善土地使用方法，就可以安置在各个地方，就可以向好的经营方式过渡：修建饮水槽、铺设通往牧场的牲口道、最终消灭有害的条田。

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冲击了人民的传统宗法意识，于是人们从利益的角度过多地关注改革的实际成效，如斯托雷平改革是革命引发的；斯托雷平和政府的目的在于摧毁村社；改革是强制推行的等等^③，忽视了改革的真正意图。斯托雷平说：“11 月 9 日法令的基础建立在明确的思想明确的原则之上。很明显，这个思想应该贯穿于法律草案的各个条文之中；从个别条款中抽出一条，而且用另一种思想加以替代，这就意味着曲解了法律，意味着使之失去主导思想。而这个法律的含义，它对于所有人的思想是清晰的。在农民的个性得到确定性发展的各个地方，在村社作为强制联盟成为农民独立障碍的各个地方，在必须给农民侍弄土地之自由的各个地方，在必须给农民劳动、致富和管理自己所有权的各个地方，应该给他驾驭土地的权力，应该让他避免过时村社制度的盘剥。”^④ 斯托雷平继续说：“如果这个思想是明白的，如果它是正确的，就不能把对立的观念引入法律之中；不能一方面忏悔说，人们成熟到了拥有熟练而没有束缚地支配自己自由劳动的精神力量，就像他们认为这是好的一样，而另一方面又承认这些人信心不足，没有家庭成员的剥削就不能管理自己的财产。”^⑤

①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95.

② Там же, С. 95.

③ Тюкавкин В. Г.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Столыпинская аграрная реформа, 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1, С. 132, 151, 153.

④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176.

⑤ Там же, С. 176.

这样，斯托雷平就直接转向了对专制家长的宣战，并利用区分个人所有权和家庭所有权两个概念的机会揭示他通过改革培养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幸福锻造者的目的，从而实现农民个性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他说：“个人所有者，按照法律的含义来说，有权支配自己的土地，有权管理自己的土地，有权要求把独立的一块土地归拢到一块地方，允许给自己购买土地，允许把自己的土地抵押给农民银行，最后允许出售它们。”^①“家庭所有制呢？第一，不是给土地而是给所有者设置限制……不经家庭成员的同意，不经家长孩子的同意既不能出售自己的地块，也不能抵押自己的地块，甚至也不能管理它，把份地归拢到一块等等。”^②“这样，没有一个家庭的悲剧不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小的家庭村社在未来就面临着小的条田制的危险，而现在呢，无疑将瘫痪个人的意志以及居民的个人创造。”^③

斯托雷平坚信，无论是来自左面的，还是来自右面的，家庭所有制都犯了深刻的错误。他坚信，只要沙皇还相信俄国农夫的力量，相信俄国农民的力量，政府就能够承担起重大的责任，就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将近 50 万的家长管理 320 万俄亩的土地。最主要的是，当他的愿望成为法律的时候，他依靠的是智者和强人，而不是醉鬼和弱者^④。从这个意义上讲，斯托雷平构建公民社会基础的战役已经打响。

三 保守主义思想

斯托雷平改革涉及的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是斯托雷平改革的两大核心问题。两大问题都是以非常法的形式颁布，也都引起了整个社会左派与右派的强烈反响。左派从革命的立场上不相信政府是公正的，他们把力量用于责难政府，推翻政府；右派则从固守专制传统的角度责难政府的变革，不仅质疑斯托雷平篡夺沙皇的权力，而且把俄国引上了动乱的道路，他们不仅阻挠犹太问题的解决，还阻挠西部地方自治，质疑斯托雷平违宪。斯托雷平失去了沙皇的信任，刚刚恢复平

①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176 – 177.

② Там же, С. 177.

③ Там же, С. 178.

④ Там же, С. 178.

静的社会再掀波澜，出现了黑色百人团制造的嫁祸犹太人的贝利斯案件^①以及勒纳惨案^②等。斯托雷平的建立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思想遭到了质疑，出现了后来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提出的俄国特有的革命悖论：“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显然是考虑到，除了以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名义给予俄罗斯帝国内部的许多非俄罗斯民族以极端不受限制的支配自己命运的自由，就没有任何更加可靠的手段可以使他们支持革命的事业，支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事业。这同布尔什维克对待俄国农民的政策相类似，直接占有贵族土地的口号应当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从而使他们拥护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旗帜。可惜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打算都完全落了空。”^③

其实，引发左派和右派对斯托雷平改革的攻击并再掀革命浪潮正是斯托雷平改革。然而我们非常清楚的是，斯托雷平改革的目的正是消除俄国动乱的原因并把矛头直指社会主义。他说：“政府应该避免废话，但是有一些几百年来一直激烈撞击俄国人心灵、表达情感的话语，这些话语应该烙在思想里、反映在统治者的事业中。它们是：不断遵循俄国的历史原则以抵御无根的社会主义。这是愿望，这是更新、照亮和壮大祖国的强烈愿望，它与打算分裂祖国的人相反，最终，这不是以生、而是以死忠诚于俄罗斯化身——沙皇的祖国。”^④ 甚至他在论述革命者提出的土地国有化时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国家性的反对者想选择一条激进主义的道路，摆脱俄国历史过往和文化传统的道路。他们需要巨大的震荡，我们需要伟大的俄罗斯。”^⑤

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分别用民粹主义和民族意识概括革命者和民族主

① 贝利斯案件是俄国黑色百人团嫁祸犹太人屠杀俄国男孩的案件。1911年3月12日，13岁的俄国男孩安德烈·尤申斯基去上学的路上被杀。基辅警察局调查厅调查结果倾向于是被犹太人折磨而死，其目的是榨基督徒的血做复活节无酵饼。随后杜马的右派党团紧急质询内务部和司法部，右派代表Н. Е. 马尔科夫指出，犹太教是仇视人类的、严厉的、野蛮的杀人宗教。最终，质询因指向宗教仇恨而被否决。斯托雷平干预了这件事，要求彻查，还原真相。然而，斯托雷平被犹太革命者暗杀后，质询再起，斯托雷平之死也成为犹太人杀死俄国人的证据。1913年10月28日，调查结束，贝利斯被无罪释放。这件事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右派向国家银行基辅分行贷款遭犹太银行家拒绝引发的。参见А. Миндли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14, С. 277 – 292.

② 勒纳金矿案发生在1912年4月。起因是这里悲惨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3月4日，因商店供应质量低劣的马肉而引发900人罢工，3月下旬人数达到6000人。1912年4月16日，沙皇派兵镇压了工人，死亡270人，伤250人。杜马随后对勒纳金矿案进行了紧急质询。政府和杜马派出两个调查组。结果取消了勒纳黄金有限公司的垄断权，改组了行政机构，工人住的旧房子得到更新，提高了工资，改善了劳动条件，当地的警察局长受到了审判。然而，这件事却引发了彼得堡21万工人大罢工，国内反政府情绪滋长。

③ [德]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④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108.

⑤ Там же, С. 96.

义者的思想。他说，受东方政教思想的影响，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蕴含着极端性。就民粹主义而言，“俄国的民粹派是无政府主义和女性的，内部缺乏对自发本能的雄性控制，没有固定的原则。”^① 就民族意识而言，俄国的民族主义是过时的和反动的，是对过去有毒的回忆和联想，是对现实的满足和膜拜，是完全的沙文主义、自我吹嘘和自我满足^②。“人民性不依赖于阶级属性，不依赖于生活的物质条件，人民性是纯粹的精神范畴，每一个俄国人都应该告诫自己：我就是人民自身，我自己的深处就是人民生活的深处，人民性是从内部揭示的，而不是外部，当我不在表面而在深处的时候，当在深处摆脱了所有等级和阶级的社会外壳的时候，当人民的声音从这个内心的深处响起的时候，我就感到自己是人民并具有了人民属性。”^③

斯托雷平在建设民族国家和公民性的时候，显然也着眼于这一点。但是，受东正教极端性的影响，他的行为也不免这样的极端性。他在评价革命者思想时说：“现在，对于所有人来说，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由极左派政党发起的毁灭性运动正在变成强盗行为，并推动了一切反社会的犯罪因素的发展。”^④“这些犯罪表明，革命组织尽一切努力阻止政府的平静工作，瘫痪队伍以及利用粗暴的强制停止任何思想工作和任何国家层面上的创造性工作。”^⑤ 他进一步引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证明自己的观点。如：“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在人民起义的阻击下，政府所依靠的军队才能动摇，顽固的专制制度的暴政才会摧毁，只有斗争才能使人民赢得国家政权，才能赢得土地与自由。”^⑥“为了让国家建立在全体人民自由选举的代表制的基础上，必须召开不分信仰、性别和民族、经过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的投票选举的立宪会议；为了让所有政权和官员通过人民选举产生并由他们撤换，除了人民设立的并对人民及其代表负责的政权，国家不可能有别的政权。”^⑦

斯托雷平的指控是正确的，因为在革命浪潮的席卷下，从1905年10月到1906年10月，被炸死炸伤的国家公职人员3 611人，截至1907年年末，数字上

① Бердяев Н. Духовные основы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опыты 1917 – 1918 гг. С. 200.

② Там же, С. 210.

③ Там же, С. 207.

④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98.

⑤ Столыпин П. А. Программа реформ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1, С. 28.

⑥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75.

⑦ Там же, С. 76.

升到 4 500 多人^①。从 1902 年开始，与恐怖暗杀宣战的内务大臣纷纷被杀，他们是 Д. С. 西皮亚金、В. К. 普列维，接下来便是斯托雷平自己。1906 年 8 月 12 日，他的别墅被炸。虽然斯托雷平幸免于难，但是 27 人被当场炸死，33 人被炸成重伤，成为“自 1880 年 2 月 5 日冬宫民意党爆炸案以来最血腥的恐怖活动”^②。1906 年 8 月 19 日，根据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提议设立了战地法庭。在战地法庭存在的 7 个月的时间里，共判处了 1 102 人死刑，实际执行的为 683 人。从 1907 年到 1909 年，战地法庭转为战区法庭后，共判处了 4 232 个死刑，执行了 1 824 人。^③

斯托雷平非常清楚，战地法庭不能解决俄国的革命问题，但是他还是同意设置并以此显示政权的国家性。他在给沙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无奈。他说：“让我们痛苦和羞愧的是，只有杀死几个人才能防止血流成河。”^④但是，正如未来的宪兵军团的指挥官 В. Ф. 准可夫斯基说：“这些法庭并不能证明大臣会议对它寄托的希望是正确的，我甚至认为，他们带来的危害比好处更大，因为它们加剧了恣意妄为，扩大了不满的队伍，而且对这些法庭的忠诚常常取决于个人的性格和观点。”^⑤果然，当斯托雷平以往革命队伍中派驻间谍来摧毁反对派政党的时候，带来的则是革命者对政府的报复，这就是著名的阿泽夫间谍案。

Е. Ф. 阿泽夫是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第二代领导人，曾策划暗杀了内务部长普列维和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然而，同时也是政府派往社会革命党内部的警察局的奸细。他是被亲社会革命党观点的新闻记者 В. Л. 布尔采夫和 1905 年担任警察局长的 А. А. 洛普欣联合揭发的。阿泽夫是贫穷的犹太裁缝的后代，由于贫穷和仇恨干起了告密的差事。阿泽夫的事件败露之后，杜马曾对斯托雷平提出质询。斯托雷平就挑唆一事回应杜马，并指出了为政府提供信息的人和唆使人犯罪者的区别。发誓说，“只要我当政的时候，政府绝不使用挑唆作为方法或者制度。”^⑥然而，揭露这件事的警察局长洛普欣被判处五年监禁，阿泽夫这个道德败坏的人却远走海外。阿泽夫案件摧毁了社会革命党，同时也预定了斯托雷平的命运。用社会革命党普通党员的话

① Табачник Д. В., Воронин В. Н. Крестный путь Петра Столыпина, Харьков “ФОЛИО”, С. 141.

② Бородин А. П. Столыпин реформы во имя России, М.: Вече, 2004, С. 60.

③ Табачник, Д. В. Воронин В. Н. Крестный путь Петра Столыпина, С. 158, 159.

④ Столыпин П. А. Переписка, М.: РОССПЭН, 2007, С. 20.

⑤ Степанов С. А. Великий Столыпин “Не великие потрясения, 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М.: Яуза: Эксмо, 2012, С. 204.

⑥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203, 204.

说，他们谁也不再相信了^①。

实行土地私有制改革的 11 月 9 日法令是斯托雷平建立公民社会基础的举措，这的确击中了俄国农业落后的病根。然而，由于政府与杜马之间的不信任，斯托雷平不得不以非常法的形式颁布。经过了第二届杜马的激烈争论，又经过了改组了的保守派第三届杜马的讨价还价，一个本可以轻松通过的法律条文却经过了整整五年的讨论才成为法律。土地问题的争论的性质已经向政府表明，拉近对立观点的距离的机会是多么渺茫啊！^②

阿泽夫现象是俄国的政治毒瘤，这是俄国政府执行歧视犹太人政策的恶果。当斯托雷平利用沙皇支持改革准备解决这一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时，却遭到了沙皇的否决。沙皇说：“虽然有最令人信服的理由正面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内在的声音越来越让我坚定，我不能作出这个决定。”^③ 而斯托雷平提出的取消有关犹太人的一系列限制都是些如斯托雷平自己所讲的“不被现实情形证明正确的最窘迫的限制”，如取消犹太人聚集区内的流动限制，允许生活在农村。扩大犹太人在聚集区之外选择定居点的权利，尤其是师傅、艺人和家庭成员；取消犹太人参与生产销售酒精制品、矿山和其他手工艺的限制，取消占有租赁不动产的限制等^④。同时，取消这些限制完全出于正常人的良心。可是，就是这样简单的生存要求却成了贵族联合会成员 205 人督促沙皇不要签署斯托雷平解决犹太人问题草案的内在理由^⑤。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解决西部地方自治这个问题上。西部地方自治是发达的少数民族波兰人、波罗的海人、犹太人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自治问题。这个提案早在 1890 年 6 月 12 日就拟就了，由于担心波兰人等发达的少数民族过分发展而没有变成法律，直到 1910 年 1 月 20 日斯托雷平作为杜马决议提交委员会讨论^⑥。有人说，斯托雷平实行西部地方自治，是为了减少西部各省波兰人在国务会议中的名额，增加俄国人的名额，以解决西部地区俄国人与波兰人的不对称问题，具有民族主义的倾向^⑦。无疑，从斯托雷平提出的用民族选区代替 1890 年的

① Степанов С. А. Великий Столыпин “Не великие потрясения, 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С. 247.

② Там же, С. 261.

③ Столыпин П. А. Переписка, М.: РОССПЭН, 2007, С. 22.

④ Федоров Б. Г.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П. А. Столыпина, М.: Гареева, 2003, С. 348.

⑤ Там же, С. 349.

⑥ Федоров Б. Г.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П. А. Столыпина, С. 359.

⑦ Там же, С. 357.

等级选区选举议员，有利于提振弱小的俄国农民抗衡发达的波兰地主，同时规定地方自治局的主席和主管教育的议员必须由俄罗斯人担任可以证明斯托雷平的偏向，但是从 1863 年以来波兰人与俄国人的敌视情形来看，西部的发展问题不予解决，俄国革命的问题根本得不到控制。这样明显的问题，由于保守派贵族对斯托雷平的不信任，居然也成为质询并压死斯托雷平的最后一棵稻草。

结 论

斯托雷平的民族法制国家思想一直备受争议，特别是他提出的建设“俄国人的俄罗斯”成为斯托雷平民族沙文主义的证明。甚至在右派的眼里，斯托雷平的宪政思想和东正教完全背道而驰^①。纵观俄国历史，俄国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阴影下展开的，因而民族国家思想具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到了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甚至提出了泛斯拉夫主义思想，显示了民族独特的孤立主义特征^②。然而，俄国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俄国走向现代法制国家的必要步骤。俄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是俄国对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简单回应，民族国家建立所必需的民族思想产生于 19 世纪 30 ~ 40 年代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③。

多数人认为，斯拉夫派谴责彼得时期的西化政策、歌颂彼得以前的政策是幼稚的，但是它反映了彼得西化改革给俄罗斯民族精神造成的伤害，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形成了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的膜拜，丧失了创造性^④。斯拉夫派提出的东正教、专制制度以及农村公社三位一体，特别是提出聚合性思想，显示了俄国因长期缺乏宗教建设引发的民族凝聚性的丧失。于是，斯拉夫派提出的国家对人民表现出的爱的思想是俄国农奴实现解放、走向现代公民的必要步骤。所以，在农奴没有获得解放之前，以卡拉姆津为代表的俄国保守派不主张实行共和主义，而主张实行君主制度，对农民实行启蒙教育。然而，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贵族与农民变成了利益关系，斯拉夫派提出的关爱农奴的思想变成了维护贵族地主土地利益的借口。随着民粹主义思想的兴起，斯拉夫派成为维护专制制度和农

① Сидоровнин Г. П. П. А. Столыпин. Жизнь за Отечество.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1862 – 1911), С. 300.

② 张昊琦：《俄国孤立主义：意识形态与历史心理》，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③ [俄] 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邱运华等译，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 页。

④ 同上，第 16 页。

奴制度的反动力量。以至于维特从利益的角度出发谴责村社友爱精神为“特殊的俄罗斯精神”，村社也成了方便放牲口的机构^①。直到莫斯科地方自治局主席、十月党人希波夫，才从东正教的角度提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友爱关系，同时依据法制原则避免国家爬向政治冲突^②。希波夫的原则也成了十月党人与斯托雷平政府在第三届杜马合作的理论基础。

斯托雷平显然是一个斯拉夫派的君主主义者，也承认东正教对于俄罗斯国民的影响，但是他没有把宗教信仰当作偶像一样崇拜，而是把它作为引导社会生活的方法论。俄国农民长期受东正教的熏陶，形成忠君爱国思想。俄罗斯国君自彼得以来接受西方化思想，逐渐把俄国引上现代个性发展的道路，这符合俄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是由于东正教人人友爱思想的虚弱才制造了君主与国民的隔阂。随着东正教友爱思想的复兴，君主引领的现代个性的自我发展必将为俄国国民所接受，从而重振俄罗斯。所以，斯托雷平改革是把传统的君主主义和现代公民社会联系起来的桥梁，他的改革造成的纷争也是宗教教条化的产物，是改革阵痛。斯托雷平改革是巩固俄国从革命走向稳定，实现社会解放的保守主义的改革。正如斯托雷平自己所说：“要知道最高政权是俄国国家思想的保存者，他体现了他的力量和完整，如果俄国还存在，那么只有所有儿女的努力才能保存它，保护这个曾经锻造俄国的政权并保护他免于瓦解。”^③

遗憾的是，斯托雷平的小步推进遭到了把沙皇政权教条化的保守派的反对，曾经支持斯托雷平改革的十月党也因斯托雷平频繁使用非常法第 87 条与斯托雷平展开立法形式的斗争，放弃了对斯托雷平的支持。在弄权的保守派的阴谋下，斯托雷平失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任。长期形成的东正教“凯撒化”^④使得斯托雷平成为纠正这种现象的牺牲品，斯托雷平改革付之东流。直到普京执政重新提出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才使得斯托雷平的改革思想重放异彩。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俄] 谢·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张开译，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92 页。

② Шелохаев С. В. Д. Н. Шипов：Лично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М.：РОССПЭН，2010，С. 35.

③ Пе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Нам нужна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С. 107.

④ Бердяев Н. Духовные основы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опыты 1917 - 1918 гг.，С. 302.